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五五期 ——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6f)

【史海钩沉】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	雷 颐
【以史为鉴】	国家民族进步的“反面资源”	王学泰
【文献资料】	傅世安给毛泽东上书及其他材料	傅世安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

• 雷 颐 •

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到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时，文教界的大批判已经十分激烈，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一些高层领导人已被渐次打倒，“序幕”已近尾声，第一幕即将开始。

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十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

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告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28页）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告”之不易。此时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告”前去专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虽然电台和报纸对邢台地震的报道时断时续，并很少上“头版”，但毕竟时有报道，还是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甚至有60多名藏民星夜兼程，送来了240匹良马！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43页）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示。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30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

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边疆文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讲：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钱钢：《唐山大地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在“生命至上”一文中，笔者对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后强调“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的种种“怪现状”已有评析，兹不赘述。

回顾“文革”十年的三次抗震救灾，无非想将其与此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比较，使人对历史发展的曲折、对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化能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

## 【以史为鉴】

### 国家民族进步的“反面资源”

• 王学泰 •

李慎之先生多次谈到“文革”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是社会进步的“反面资源”。他说，我们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就“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又说“‘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人们的心头，不妨说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已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现在读来，仍是如同醍醐灌顶。

当代的蒙昧是指长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未能接受现代文明，脑子尚停留在前现代。这是

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中国有两三千年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亿万个性不成熟的人们很少独立思考。他们易于被统治者玩弄股掌之上。像“文革”这样大哄大喻的“群众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蒙昧者不知道自己一些行为的目的，正像哈维尔所说，蔬菜店老板在自己店的橱窗要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一样。“文革”中许多政策触动了人性之恶，蒙昧者被无名的嗔恨所支配，喊打喊杀，“格杀勿论”“砸烂狗头”“火烧、油炸”一类标语触目可见。实际上，由于蒙昧者是对自己处境不满，往往被“恨”所笼罩，而且并非因为有“爱”而恨，那些口头的“爱”不过是恨的标牌而已；“文革”中除了圣物以外，一切都可以成为嗔恨的对象，举着“砸烂旧世界”旗帜，扫荡一切文明，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浩劫。在恨的冲动的驱使下，不仅昨日的师长、朋友，今日就能拉来揪斗，甚至一家子里面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可以反目成仇。在“红八月”期间，我亲眼见过老父在烈日下汗流浹背地“劳改”，儿女就是挥动皮带监督他们劳动的红卫兵。从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把×××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话来看，人们要积攒多少怨恨，才能发出如此决绝的不共戴天之声！？人可能因爱而有恨，但恨不能作为办事情的出发点，要造就和谐社会应该从爱出发，这样才不至于导致社会的撕裂。

蒙昧者的眼光极其狭隘，色彩分辨率极低，五色斑斓的世界，只视作黑白两色。纷纭复杂的世界被分割为“好”“坏”两极，凡附我者就是好，反之则坏。其看待人群上，把芸芸众生分为敌我两极，整日念兹在兹，成为不可一解的情结。凡事先分“敌我”，缺少应有的是非观念，而且稍有异议，就以敌人视之。如何把所谓的敌我分开，最简单的就是给对方扣上一顶侮辱性的帽子。“文革”最初还说是整“三家村”“四家店”的“黑帮”，只要是批斗，马上“荣膺”一顶“黑帮分子”的帽子。后来帽子越来越多，如：地、富、反、坏、右、敌、宪（当过宪兵）、伪（日本时期做过事）、警、特、僧、道、巫、尼、娼等共十五大类。这还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还有新揪出的：特务、叛徒、走资派，更扩展为工贼、内奸、臭老九等以及五花八门的政治帽子，还配以各种侮辱性的标志。如戴高帽、剃阴阳头、较长久的是胸前挂上牌子。由于揪出的“敌人”太多，单位“牛棚”（牛鬼蛇神居所）住不下，个别的允许回家。但得挂着牌子回家，第二天上班时，把牌子夹在自行车座子上，到单位门口，拿出牌子，挂在脖子上，弯腰躬身进单位。此情此景，尚历历在目。扣政治帽子的目的有二，一是分门别类，让“革命群众”分清敌我；其二就是侮辱，让“革命群众”看看，这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使他们有所畏惧。这种乱扣帽子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尊心和人格。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当时乡绅最怕农会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因为一游街，颜面扫地，从此不能做人。“文革”被扣过帽子、游过街的人，数以千万计，给多少人心灵上造成过伤害？粉粹“四人帮”后，常贵田说的一个相声就叫《帽子工厂》，反映了恢复正常的人们对于这种做法的憎恶。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大多对扣政治帽子行为很反感。

蒙昧者处理问题则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先是语言暴力，人类创造的一切具有威慑力的词汇，倾巢而出，再加上侮辱性的污秽语言，充斥在人们的口头，甚至报刊。例如被一位学者举证的当时在多家报刊刊登的《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一文，其中就充满了暴力语言和污言秽语：“这简直是放屁”、“砸烂它的狗头”、“大反扑的狂吠声中”、“混蛋们你们听着”……这像一个文明人所为吗？人们所处是个文明环境吗？！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孔子也用的是这一套，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暴力语言之后，就是暴力行动，一言不合，便要开打，北京是中央所在还好，武斗只是大刀长矛，而外地，例如四川不仅机枪手榴弹，连坦克车都出动了。1979年，我去成都出差，武斗的炮弹皮还有嵌在街道两旁树皮上的，青羊宫的墙壁上还有弹洞。时过境迁，“文革”流行的许多词汇消失了，但“打砸抢”留下来了，这个词的全称是：打砸抢抄抓。现在写到这个词我都能闻到它的血腥味，血腥正是“文革”的特征。

那时政策上也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说什么“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肉”。

这句话生动说明“文斗”也是一种“鞭刑”，不过它更深刻，不满足于只抽打皮肉的“武斗”，还要更进一步地拷打平民百姓的灵魂。为什么这一批人就有权力抽打另一批人？当时的解释，被拷打的都是“灵魂”上不够好的人，或者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一群自认为身世清白、思想够好的庸众就担任行刑者，或说思想上的杀手。其目的是迫使人们的思想“归一统”。至于结果如何，后来的发展人们都看到了，这里不赘述。其实，许多处在上层的人士，甚至包括“触及灵魂”的发明者都懂得，改变人的灵魂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应认识到思想多元的必然，互相宽容，不要弄一部分人去改造和批斗另一部分人，这样不仅使得被整的人蒙冤，更荼毒了整人者的灵魂，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上面所说，在青年人看来也许是陈谷子烂芝麻了，然而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谈到这些还有切肤之痛。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最初的日子里，虽然经济还有困难，社会还有乱象，而且三十年遗留的问题成堆，可是社会是团结的，人心是蓬勃向上的，因为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对于类似“文革”的过激的、暴力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所警惕。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了，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改革的滞后，人们对于“文革”的基本特征——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极端主义淡忘了。前几年听说，有的领导人在人代会小组会谈起“文革”时期内斗的残酷，感慨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这几年因为与媒体打交道多，认识的青年人不少，对此深有同感。因此我们要对“文革”思潮的特点、它的残暴丑陋经常讲，使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此有所警觉。这些日子里，社会上和网络上的表现，有哪些故态复萌？有哪些是旧技重演？这是值得举国深思的，特别是经过“文革”的老年人。

三十多年前常说，“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古人云“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一次“文革”，已经举国难支，几十年攒下的家当（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几乎扫地以尽；还要预约再搞！？然而这“七八年”之说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一个估计，因为社会矛盾的存在，人们内储的因压抑而形成的能量如果没有正当的、及时的出口，到一定时间就会激化，就可能演化为无序的、暴力的、期盼上下易位的“群众运动”。当时这被视为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即所谓“大民主”。它仍然是“周期率”的反映，当政者希望通过有控制的“小乱”，释放能量，以避免失控的“大乱”。然而，大小之间，如何划线？“控制”和“失控”之间如何操纵自如，都在未定之天。我认为避免社会动乱的最佳途径还是建设法治社会，进行公民教育，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但应该从当下做起。

□ 原载《南方都市报》

~~~~~

## 【文献资料】

### 傅世安给毛泽东上书及其他材料

• 傅世安 •

（傅世安（1939年11月～ ）男，汉族，旅大市人。1960年，傅世安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宽甸，先后在宽甸师范、宽甸初中、毛甸子中学、牛毛坞中学任历史、政治教员。1967年3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17年徒刑。

傅世安从五八年升入大学后，即对“阶级路线”、大跃进、打倒彭德怀等错误极度不满。1966年春，全国造神运动气氛越演越浓，这激起他的严重不安，对文化大革命与极端专制主义有日益清醒的认识。1966年7月3日，傅世安毅然上书毛泽东。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独裁和愚民政策，以及主导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林彪神化毛泽东的一系列说法和做法，进行了全面剖析和批判，明确表示了坚决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和专制独裁的不妥协观点，和坚持

真理、与极左路线斗争到底的姿态。

1967年2月，傅世安再次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己反对愚民政策反对专制独裁的观点和态度，进一步就造神运动、愚民政策和专制独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批判。1967年3月19日，傅世安被逮捕，定为反革命罪，判处17年徒刑。在凌源劳改支队劳动改造11年，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和迫害。

1978年11月傅世安得到平反，宣布无罪释放。后任宽甸县一中历史教师、二中政治教师、宽甸县文教办、县政府办工作人员、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

#### （一）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同志：

请你耐心地把我所写的读一遍。

你具有政治家的涵养。你可能会以冷漠的置之不理来对待我的这些浅薄的胡言，把它当成是“小知识分子”的无知。你具有思想家的情操，你也可能被我所写的这些“叛逆”性言辞激怒，大发雷霆。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实是把你当成独尊和私利的维护者，我称你为独夫、暴君，甚至对你作了谩骂。

现在，我的思想又变了，人的思想在运动中变的非常快，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对外战争之世界革命，终是必需的。你为了这些受到关于“独夫”和暴君的责骂是可敬的。

但是，我的文章既然写了，而且我认为你以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来对待自己原是革命的思想，还是错误的。虽然，我的这篇文章不正确的把你当成反对者，我还是希望你看到这篇文章，接受我的意见，以便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你（我说你们）将怎样来处理我呢？

如果对我提出的种种问题采取冷漠的置之不理，却把我当成反革命（要知道，“反对毛泽东”就是反革命呀！）分子抓起来，那么我，不唯是蹲班房，即是死也不惧。因为我是无私的，我的一生是属于人民的。反过来，对于你却显示了无能。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将这篇文章公布于世，（这种可能很大，但这样做或者会不利于我国思想的统一及对外战争）让群众来批判，把我斗垮斗臭。我是会被斗垮斗臭的，我不会跟群众辩论，群众现在无限崇拜你、信仰你，当然要反对这篇反对你的文章。不过，群众将来会判断是非的。我被斗垮斗臭了，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后到某地去劳动改造，这我都不拒绝。我没有个人的前途，我只是想把我身上的每一条筋，每一根骨都献出来，给共产主义、给世界革命。

我是一个乡村中学的教员，现年二十六岁。我原是在城市长大，度过学生时代，虽然抱着到农村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但身上却满载着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此次文化大革命，使我脱胎换骨了，我觉的我好象踏到地上了，我现在所缺少的是：一、较长时间的跟公社的社员在一起劳动，当一个农民。二、亲身检验一下反帝斗争战场上的生活。三、把我有关消除城乡

差别、防止和平演变、世界革命及战争的意见提出来。

我的现住址：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牛毛坞初级中学。

傅世安

1966、7、15

最近又有三件事感动了我：

一、 我在运动中受了批判，受了教育，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的宽宏大量。我坚定了向你提出意见的决心。

二、 你的把全国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的指示，使我们仿佛看见了消除三大差别的远景。

三、 继承抗大传统，确定了办教育的方向，但要研究一下在小学中学、大学应用抗大传统的具体作法。

（二）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毛泽东的万言书

### 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有半年多了。这是革命吗？是革命。旧文化的命被革了，象始皇帝坑除了百家一样。但是文化不会被坑除，始皇帝的意志只是横行一时。始皇帝之后，文化又继续发展了，不是继续旧的百家，也不是遵照始皇帝的意志，而是在向新的方向前发展了。

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要看到它的否定。事物在向前发展，发展中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发展到顶点之后，要使原来的事物解体，产生出新的事物。始皇帝的使命完成了，他也便逝去了。他的声望达到了最高点，他打倒了一个敌人又一个敌人，他踏着一阶又一阶的梯子到了楼上，他的基础也随着被撤掉了。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所处的地位使他看不到这一点，他被尊严和虚荣迷住了。

然而，这是事实，这是客观存在，不是赫赫威势所能掩盖的，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自居所能抹煞的。这个“宠然大物”，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豆腐老虎。

难到马克思曾说过宇宙中某一事物是永恒的和神圣的吗？没有，因为这是违背辩证法的。

请看这形而上学的语句：

“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接过来，传下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从而保证我们的国家五代，十代永远革命、永不变质……”《我们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

再看：

“毛泽东思想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的真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

的理论和实践，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同上》

还有：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同上》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革命的缔造者，……”《我们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

革命即是变，而且是质的变，旧的变去了，新的变出来，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呀！把一种革命的思想说成是永恒的，这是多么荒谬的、不革命的思想呀！

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革命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在经常改变的。经济是在经常变化中的，政治要随着发生变化，意识形态也要变化。在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政治形式的演变要经过许多阶段，无产阶级专政要向前发展，一直到自身的消逝。怎么能够认为你所建立的一套，必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不改变呢？修正主义的帽子恰好应该扣在不革命的头上。马列主义是革命的，违背它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来是革命的，违背它也即是修正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要千代万代的传下去，这既是违背马列主义，又是违背“革命”的毛泽东思想。革命的思想应该自觉的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性，不能把自己神圣化，革命的思想应该知道自己现在建立的一套是暂时的，经过一个阶段就不适用了，就要废除，否则它就要阻碍历史的发展。

历史是挡不住的，它要向前发展，把革命的车轮拆卸在一家的门前是办不到的。

千代万代的传下去，怎么可能呢？秦始皇帝也曾经以为他的子孙要千代万世的传下去呀！

不能把一种思想看做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最伟大的真理——如果可以的话，也只能是对过去——因为任何真理都是历史的需要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说明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一方面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继续。任何被当做真理的思想都不是永恒的，更不能把它绝对化。一种伟大的思想只能在一个时代里起到历史的作用。时代向前发展了，他还要固守自己的思想，或者固守其中的错误部分，或者把正确的思想固守在陈旧的模式里，他就转化为唯心主义了。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他本来是伟大的，他的思想本来是真理，但是现在，他把自己的思想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起来，他要否定他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把自己的功劳看成是旷古未有的，空前绝后的。

的确，他是革命的伟大领袖，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他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世界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这一点来说，他同列宁一样，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缔造，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首功应该属于他。但是，他的功绩是有限的。这个限就是不能超过人民群众。“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不是劳动人民自发的产生的，可也不是他个人的天才产生的。如果认为他是革命的一切的缔造者，没有他就没有一切，这就是忘了群众的作用。一方面，要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的革命，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英雄豪杰。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也是历史的、社会条件的产物。把历史上的一切都否定了，这就是说历史上的一切都不是历史的存在着的，他们本来就不



应该产生。把现在的伟大领袖绝对化、神圣化起来，这就是说现在的伟大领袖也不是历史的存在，他应该是无限神圣和绝对的。他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上帝降下来的吗？

一个伟大的开端，常常遭受到悲惨的下场。一个伟大发起人的继承者，常常是在他的失败之后，在多次曲折反复中朝着前进的方向走上去的。历史是迂回的，不是直挺的。

秦始皇帝正是把自己看成了空前，所以他才绝后，他空前的超过了三皇五帝，他绝后却是只绝了自家的后，“皇帝”仍然传下来了。

不对，没有空前绝后的东西，没有神圣的、绝对的、永恒的事物，辩证法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一种辩证法的革命的思想，如果将自己看成是永恒的、绝对的，便是将自己放到物质世界之上，便成了绝对理念。绝对理念认为客观世界是它的反映，并且要求客观世界服从它。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但是它现在僵化了、固滞下来了，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向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转化了。

第一，他过分强调主观能动的反作用，忽视了客观世界的决定作用。

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世界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客观的规律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动物完全是受自然支配。人却能够认识自然并在自然规律的范围以内改造自然。人类社会也是属于客观的物质世界，这个客观的社会存在也有它的自然规律。已经过去的各种社会形态的人完全受社会的支配，共产主义的人却能够认识社会的规律，并在社会规律决定的范围内改造社会。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精神的现象，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力，主观能动性就表现了这种反作用力，主观能动性确实关系到加速或延缓社会改造的问题，但是主观能动作用必须在客观规律的范围以内去改造社会。无限制的强调精神的主观能动作用就是唯心史观。只从积极有用出发而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条件许可就是实用主义。在理论上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在实践上愿意作什么就作什么，早上颁布的法令晚上就把它废除掉。

下面这段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后一半就夸大到错误了。

“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革命武器，有了它就能与山斗，山变样；与地斗，地增产；与水斗，水浇田；与林斗，林成长……”

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领导政策和劳动者的关系表现了主观能动作用和客观规律的关系。当然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就整体来说，表现主观能动作用的指导思想是集中在领袖身上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物质愿望是体现在群众那里的。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就产生了不顾群众愿望过分强调领袖思想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但是，他在向群众发出号召的时候没想到群众是在一种压力下故造声势，还是出于觉悟来大力响应呢？

不顾客观的规律，为所欲为，最后要受到现实的报复，不顾群众的意愿，发号施令，最后要遭到群众的反对。

第二，他在应该的强调了政治的统帅作用的同时，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

几论“突出政治”的文章，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说得很详细了，其中有的正确，有的毫无道理。

什么是业务呢？

业务是指人的各种具体工作，有生产的经济的工作，阶级斗争的政治的工作，军事的工作，科学文化工作，教育的工作等等。

什么是政治呢？

政治是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阶级的人的精神面貌，指导人的各项业务活动的思想意识等等。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表现了阶级斗争和生产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政治和科学文化及其他业务活动的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具体工作（包括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可以被看成是上层的精神的东西跟基础的物质的东西的关系。

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政治既然是上层的精神的故是统帅，业务既然是基础的故要受到前者的指导。

这两者，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呢？

从小处来说，有时为了完成业务工作（如生产任务），事先作一下思想动员，这是把业务当目的，政治当手段。有时为了改造人的精神面貌，布置某种活动任务，这是把政治当目的，业务当手段。

从大处来说，我们曾经为了夺得政权而搞好生产，搞好军事，现在又为了巩固政权而搞好生产、搞好军事，这是把政治当目的，业务当手段。我们也是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夺取政权，又是为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而巩固政权，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巩固政权，这是把业务当目的，政治当手段。

在阶级社会里，在现在，政治是最高目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一切业务活动、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最后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全部人类社会来说，就将来的共产主义来说，政治是手段，因为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使人走向共产主义，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辩证的。

几论“突出政治”都是把政治作为目的，业务作为手段的。但是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却说跟“几论”不一致：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到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资产阶级把民主当做目的，向我们要求民主，我们反驳了他，并说，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就是说，发展经济是最终目的，政治是手段。这种说法没有把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完全表达出来，但却唯物地解释了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关系。

今天，为了实用主义的需要，我们完全抹煞违背了政治和业务关系的辩证法，形而上学的用一个“政治是目的”的唯心主义解释代替了一切，这能够使人心服吗？这不是毫无道理吗？

以前，正是国家的某领导人曾教导青年要“以红带专，又红又专”，又是国家的某个领导人教导青年在以政治作灵魂的同时，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上，并说政治如不通过业务去体现，政治就是空洞的。

的确，政治必须跟业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对立统一的，“既没有无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无业务的政治”。

如果有人硬说政治只能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政治可以不体现在业务上，政治的体现只是它的本身，人的思想落实只是它的本身，那么，只能说，他是个唯心主义者，即使从前不是，他现在也堕落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

我们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我们每个人的是在头脑中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旧的一切，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把我们每个人造就成共产主义的新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过程能促使我们的世界观改变，经济基础的改变能促使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但是，我们还要教育人民，教育群众。用什么教育呢？用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用真理、用正确的东西来教育人民群众。毛泽东思想曾是革命的和正确的，也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信，这是一种权威，用这种权威的思想作武器来扫除人们头脑中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观是可以有很大成效的

但是，如前所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现阶段僵化了、固滞了，他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革命的框子来束缚群众的革命的思想。毛泽东的正确转化到错误了。

毛泽东的教育群众，一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用教条束缚群众的方法，二是使人无知识，不了解真象的方法。

这是一句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话：

“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口说是“活学活用”，实则是死学死用。某个时间，某一方面，联系到某个问题，便把那个条文搬过来、套上去。这不是让人们从本质上学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不是使人长期的从思想根本上接受共产主义的方法。为什么出现这种教育方法呢？就是因为他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革命的框子来束缚了本来是活的思想，因此把本来是活的思想当成死的教条让人们来接受。

前一方法和后一方法是有联系的，两者是相互帮助的，因为要用一种教条来束缚群众，所

以必须使群众没有知识，如果群众没有知识，便能加强教条的作用。

知识迄今为止，始终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信念总是以知识作它的工具的，要使人忘我，要忘掉过去的一切剥削阶级观念，建立大公无私的权威，不可避免的产生的对知识的否定。用毛泽东思想代替其他的一切知识，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必须由减弱人们头脑中的知识和对真象的了解来帮助。

这种做法不可能长时期的发挥作用。

孔子的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时间可以说很长了，但它没有永恒，它在近代被打倒了。封建制度需要一种教条束缚人的头脑，大一统需要一种权威来统一思想，封建社会的固滞状态生产力的不发达，人民的愚昧无知，帮助了这种专制思想的统治。这种专制思想的统治反过来又巩固了封建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愚昧无知。虽然这样，儒家的思想在封建制度的各个阶段里还是有变化的，它不是一个老样子传下来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今天，生产力空前的发展了，人的知识无限丰富了，人们甚至要探索宇宙的广阔和原子的深邃。想用一种教条来束缚，而且要永远按着一个样子束缚人们的头脑，怎么是办得到的呢？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的知识无限的丰富起来。想使人恢复到无知的状态里是不可能的。人民群众的知识丰富了，就要得到真理，人民群众是相信并拥护真理的，但是以真理来对待它，不是以教条来对待它。

如果我们的民族传统决定了自己必须是大一统的，思想是独尊的，那么这种大一统不会把它的土地封固在现在范围里，这种思想独尊也不会把它的对象稳定在一个人的头脑里。

一个连续的否定形成了，这是它的轮廓：

知识就其过去的传统来说是掌握在剥削阶级的手里，跟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兴共产主义。为了使人忘我，夺取人脑中个人主义的阵地，就必须建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用这一思想权威作武器攻占旧的个人的知识阵地，知识被否定了，无知帮助了毛泽东思想权威的建立，帮助了忘我的建立。

毛泽东思想本身也转化到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

还要上升到一个新阶段，用人类丰富的知识武装人的头脑，使人民群众得到辩证唯物主义，达到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使人们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共产主义就是使人们的头脑大公而忘我。这时人真正成了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原始社会，全民没有文化（相对的）；阶级社会，剥削阶级少数人掌握文化，共产主义，全体劳动人民掌握文化。

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说的多么对呀！

最后的这一否定即将到来，那时，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教育和文化的不能发展的问题将不存在。

首先，现阶段的束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思想的使他们无知的教育制度将不存在。

教育本是个长远打算的事，一种教育的结果本是在一个时代中发生作用的问题。一个人由儿童到成年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虽然基本上在一个较大的时代里，但也一定经历了社会中某些局部的变化。教育制度要适合于时代的需要，因此它要随着一个革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有新的建设或根本的改革，但它也要在较长时间里相对稳定，在它基本上适应的那个时代里相对稳定。我们现阶段的教育，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今年因为此一事件此一运动想起了用这种方法进行教育，明年又是因彼一问题、彼一需要，想起了另一种方法进行教育。迄今为止，我们的教育，就目的来说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了，但搞得乱七八糟，毫无制度，教育者感受到无所适从，只好敷衍工作，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所以这样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系统的合适的教育方法，二方面是他们没想到青少年在此一阶段受到了此种方式的教育，到数年后青少年真正要参加社会运动了，原来的运动却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教育制度要在一个较长时间稳定，要随着革命进行根本改变的道理。

我们现阶段的教育，只重视那些工具性的科目，有直接用途的内容，尽力削弱那些知识性的学科，有间接用途的内容。知识性的内容和工具性的内容本是密切联系的，当然在某些学科来说可能偏重于知识或工具，所以重视工具性的内容是因为生产的需要，所以轻视知识性的内容是因为害怕群众有了丰富的知识，有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影响对主席思想的崇拜。不许群众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思想，一切思想都要用毛泽东选集来充满。其实，这是办不到的，你使群众有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能力，你就要教给群众知识，即使只教给他们数学和物理，也要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培养他们的唯物观点。你想用毛泽东选集将他们的头脑充满，可他们正是从毛泽东选集中，从毛泽东的革命的思想中看到毛泽东对他自身的否定。

我们现阶段的教育是违背了跟随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相适应的教育原则的。我们的主席同志竟然反对给学生以集体主义的教育，反对给学生以组织纪律的教育，他以为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让学生有组织纪律就会束缚学生的生动活泼。主席同志不是不懂得关于“权威”的道理的，主席同志真的是要群众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吗？主席同志要求作家按着领导上布置的提纲编写文章，却反对小学生按着老师出的题目作文。原来这不过是想废除下面的一切权威，甚至不得不连集体的权威都要废掉，只留下主席一人的权威。教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不听，主席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理，谁敢不听呀！

顺便说一下，此次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打倒了专家的权威，领导的权威，学生起来打倒了教师的权威。服从谁呢？以谁为是非的标准呢？只许是主席一人。

我们现阶段的教育，甚至将封建的某些束缚人们头脑的教育方法恢复了。强调背诵，让学生少读书，只读几本书，读死书，用“毛主席语录”代替孔夫子论语，不教给学生使用适合于先进生产的先进工具，让学生写大楷，打算盘等等，都是封建守旧思想企图在我们教育阵地上恢复的表现，口喊叫学生生动活泼、标新立异，口喊叫群众得到活的思想，实际不是。

我们现阶段教育的这种状态，实质上说明了领袖之强调个人的作用，看不起群众。领袖不敢让群众有丰富的知识，让群众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让群众每人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领袖以为只要自己想行正确就可以了，群众只应该驯服的行动，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领袖思想的贯彻。

其次，现阶段的抹煞事实真象，不让群众了解真理的歌功颂德的文化政策将不存在。

我们共产党人是大公无私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都多次谈到共产党人应该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共产党人不应自我颂扬功德，更不应该强迫群众为自己歌颂功德，共产党人应该更多的接受别人的批评，群众的批评是必须的，朋友的、其他民主党派的批评也是有益的，如果是来自敌人的，则不是批评，应该与之辩论。要分清哪些是善意的批评，哪些是恶意的反对，把恶意的反对当成是善意的批评将对事业有害，把善意的批评一律当成是恶意的反对，一律当成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将对事业有害。只要是批评，就不管用什么形式，口头的、书面的、正面建议的，讽刺的、隐喻的都可以。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一切批评都被当成是反对领袖，所谓批评当然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见，以逻辑推之，不同意见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违背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谁还敢批评呀？我们过去曾经把批评党的干部当成是反对党，我们现在是把批评领袖当成是反对党，反对党则是反对人民，如果，领袖、党和群众是同一的，那么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而进行自我歌颂就说不过去了，如果认为领袖、党和群众是利益一致，他们之间有职务、责任的不同，那么领袖不应该强迫党的干部歌颂自己，而要接受干部的批评，党不应该强迫群众歌颂自己，而要接受群众的批评。一个人如果有自私自利的目的，就做不到这一点，一个党如果有宗派的目的，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我们相信，共产党是没有宗派的利益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是歌功颂德到只知道喊万岁。

我们的新闻工作，借口要有指导性或不报道某些事实，或对某些事实作了歪曲的解释。

厉王弭谤的故事，应该引为借鉴。我们的党和领袖与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同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的关系。但我们的领袖和党在正确的时候就会同群众结合得融洽，错误的时候就会脱离群众。

你做的事好，群众自然会说好，你的功绩大，群众自然要赞扬。如果你要强迫他，他嘴上说好，心里却不愿意。如果你有了缺点，不让他说，他憋在心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你的缺点越来越大了，甚至危害了群众的利益，危害了共产主义事业，群众就要撤换你，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毛泽东同志是善于用一分为二看问题的，为什么就没有从这普遍的万岁的呼声里看出其中的反面。

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深远的，但文化大革命不能停止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本身还要革命。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但这种思想不能终止革命，不能以不革命来对待这种革命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本身还要革命。

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就是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就是革命，批判和否定实际上就是继承。怎样继承呢？正确的认识这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正确的认识这种思想的历史性，将这种思想看成是革命的，将其中革命的内容接受过来，丰富它，发展它，将它用在改变了的社会时代里，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把它永恒化、绝对化。

社会条件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应用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的应用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使它完备。毛泽东思想传播到了国外，而且在我国建立了相当高的权威。这种权威的产生，第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这种权威的产生，第二是对外战争的需要，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不仅有国内的阶级斗争，还有国际的阶级斗争，国际阶级

斗争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国与国的战争，我们要进行世界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

权威的产生确实是社会历史的需要，但社会历史的需要也就要求这种权威必须是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有始也有终，它产生的时候起过伟大的作用，它走向极端的时候就要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它正确的时候，我们把它奉为权威，它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要固守它，而要破坏这种权威，它将起不到权威的作用。社会历史要求这种权威必须是正确的。

邓拓等人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从跟毛泽东的分歧出发，指出了毛泽东的现阶段政治思想的一些缺点，但没有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现阶段的问题作客观的社会历史的说明，毛泽东现阶段的政治思想上的问题，有的被用资产阶级观点歪曲了，有的特别是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被忽略了。邓拓等人的目的是把历史拉向倒转，这是违背社会要求的，他们的反动性就表现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上，他们本来对毛泽东思想不满，却偏偏说一些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话，他们虚假的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反对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应该打着真正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批判束缚毛泽东思想的不革命的框子。

历史是不会停止前进的，它经历了过去发展的过程，它还要展示将来发展的道路，过去推动了历史发展的人，将要被历史洪涛淹没，过去的革命建立起来的，将来要被新的革命推倒。历史的前进虽然有起有伏，但它终是在前进，不会后退。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权威、专家权威、教授权威、教师权威以及领导权威，只剩下了主席一人的权威。一人的权威就是独夫，由独夫往前一步即是群众的权威。

傅世安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

### （三）一九六七年二月再致毛泽东书

毛泽东主席：

我是丹东市、宽甸县、牛毛坞初级中学一青年教师，运动中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斗两月，五十余次。我表现的很乐观，因为我去掉了对于个人前途的一切打算。我想，即使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只要有劳动和吃饭的地方，就能够为共产主义贡献力量。虽然这样，我为了使我不站在群众的对立方面，还是委屈的按着群众指示的意思作了检查，我口头承认了自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承认了欢迎帝国主义，欢迎国民党反动派。承认了这些也没有什么，对人民，对我自己都毫无损失。不过，我自己的思想，我是清楚的，我的看法，我要坚持下去。你说，彻底的唯物主义都是无所畏惧的，确实如此，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斗争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我愿意将下面几个问题对你提出来，并接受你的批评。

第一，你教导我们要用辩证法来对待一切。根据辩证法，则所有事物无不是一分为二的。那么，你是不是也用这种方法来看待过你自己和你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呢？如果是，应该这样，如果不是，便有堕落为形而上学的危险。

几年前，我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你的领导下进行的，可是我国社会上的各种现象，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却都能够受到你的思想的批

判。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你的现在背叛了你的过去。你企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用形而上学代替自己头脑中的辩证法。我把你跟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联在一起反对了，我把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级领导机关当成了一个正体反对了，这是我没有掌握辩证法表现，因为我没有正确的理解国家政权机关内部也是存在阶级斗争的。

今天，我还在继续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关于对你的思想崇拜和革命到底的问题。

人们都说要无限崇拜你，并把你的思想千代、万代永远传下去。可以这样吗？我以为不可以。我想你和林彪同志都应该知道，对于毛泽东思想，在当代崇拜它、信仰它是必须的，传下去也是必须的。但传到什么时候，却谁也不知道，不能提永远二字。辩证法不是明明告诉我们，宇宙中没有永恒的事物吗？把革命的思想当成永恒的，这就是一种不革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是开辟出了一条道路，并没有结束真理，人们永远也得不到绝对的真理，毛泽东思想也只是相对真理，我认为，要排除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毛泽东思想（这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的权威，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采取辩证的方法，即毛泽东思想本身的方法，人们会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里认识到，现在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却正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

前面提到，崇拜和信仰是必须的。现在你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同时你却接近了最大的群众），人们在高呼着“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你是否在这件事里想到了其中包括的辩证法呢？要知道，有升必有降，有正必有反呀！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你发动起来的，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乡间教师，当然不能在开始就理解到它的全部的深广的意义，我认为它只是为了迎接国际大变采取的统一思想的措施。由封建的专制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再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统一，这是合乎否定规律的过程。我推敲了一下，认为，在这个空前的思想统一之后必然要出现一个空前的大民主，那是目前的革命的革命。后来，运动的继续进行，出乎我的意外，我理想中的很多现象竟然发生了。我这才理解到，这原来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迈向共产主义的运动。

用辩证法来观察一下，近现代的舞台，好象似历史的长过程的缩影，历史上很久以前的某些事物的特征，常常又在近代的舞台上重演（当然这是不同性质的，在更高阶段上的）。从原始共产主义到阶级社会，再从阶级社会到未来的共产主义，这是两个相反方向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历史的螺旋上便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尧舜的禅让，军事的民主制是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程里曾经实行过的制度，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从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的过程里出现的现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仍然包含着敌对阶级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矛盾。

将来，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所占比重会逐渐的，有反复的减少，人民内部的矛盾所占比重会逐渐的，有反复的扩大。到了共产主义，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会全部代替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先进和落后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先进和落后集团之间的斗争实际是新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当权派常常要站在原来制度的维护者的立场上（当然其中也会分化出相当部分的反对革命者）。“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今天主要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很可能，到了共产主义时代它又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

可不可以用秦始皇帝给你打一个比方呢？请你忍耐一点，不要大发雷霆。秦始皇帝是奴隶主阶级的革命家（所以不能把他跟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等同起来），他开创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漫长时代（我们今天建设的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他的焚书坑儒完全应该说是一场文化革命（当然不能与我们的文化革命相提并论），他曾经想叫自己的世袭由二、三到千万无穷（注意，我们的事业不是家传的，而是社会的）。秦始皇帝怎样呢？他本人遭到了悲惨的下场，他的



世袭只传了两代，经过一番曲折仍继续了下来——如果有人歪曲我的本意，说我用秦始皇给帝国主义者找根源，诅咒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是不能承认的，但我并不怕。

有革命必有反动，有前进必有后退，当然，反过来，有反动又有革命，有后退又必有前进，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是你早就说过的话，玩火者自焚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你，作为一个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是如此深远的推进了社会革命，是如此充分的发动了群众运动。你告诉人们对一切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你告诉人们造反有理，人们几乎怀疑了一切。及乎反掉了一切，这些都是对的，好得很。但是，当人们怀疑到主席著作，并且反到你的头上的时候，却受到了镇压。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革命的群众知道只许人民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不许反动派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是革命的，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是反革命的。问题是在将来（恐怕也不用等到将来），你想到还要发生什么曲折吗？直接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不行了，那就来间接的，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是蠢人才能喊出来的，没有哪一个明白人告诉你，他是反革命的。啊！所有的都成了捍卫你的力量，多么统一啊！多么集中啊！可是这捍卫你的力量的人们中间互相斗争着、削弱着。真正的，你的卫士也被拉下马来，为什么？因为在你打倒敌人的同时，你又给了敌人以武器和假面。你能够亲自出来告诉人们到底谁是革命者吗？形而上学的头脑看不到这种曲折，用辩证法来考虑一下就可以预备好，迎接这种曲折。那些被打倒了的反动派，今天戴了高帽子、抹了黑脸，明天，他们必要借尸还魂，兴风作浪。

第二，你教导我们要政治挂帅，重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是很对的，但我认为同时不应该忽视物质措施和客观条件的基础作用。扩大了前者，放弃了后者，岂不成了唯心主义的调子，可是修正主义就是强调物质刺激，忽略政治挂帅呀。且慢，下面两方面内容说明了我的看法与修正主义根本不同：

一、修正主义单纯强调物质刺激完全忽略了政治挂帅。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应该是在重视政治挂帅的同时，不轻视物质措施的基础作用。挂帅既是指导，这种指导焉能没有基础。

二、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作用使人和人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当权派和群众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等级差别扩大。我认为，调整工资，使人们的工资集中在一个水平线的上下，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措施。另外，脑力劳动者参加体力劳动是个严重的事，脑力劳动者们光是喊着口号响应你的号召，却并不愿意实行，因为参加体力劳动，多少要受一些皮肉之苦呀。你曾说要把那些学者、专家、艺术家们统统赶到乡下去，不下去就不开饭，这“不开饭”，我看就算物质措施。如果那些学者、专家们照旧领了国家工资（而且足够其奢华浪费），既使在运动期间随着大势下去了，运动过后，还要陆续的回来，要使脑力劳动者坚持下去，参加体力劳动，应必须在政治上挂帅，用群众运动改变了他们的状态之后，跟着以物质措施巩固运动的成果，比如，使科学、文化单位和工厂、公社结合起来，学者、专家、艺术家们成为工厂、公社中的普通劳动成员，给他们规定一定的体力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跟工人和社员享受一样的劳动报酬，这样，他们与工人，社员有了共同的物质利益，也便能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了，所谓物质措施，实际上，我们已经作了不少，但终未能坚持下来形成制度。

我又读了一下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那里提到“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实行的怎样呢？有很大成绩，但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你每提出一项号召，百姓们便在下面大搞一番声势（其实这是那些“媚上压下”的当权派老爷们搞的，不能怨百姓。）声势过后，动作的精力也消耗了一半，应该作的事，便也只好扔掉一半。应该怎样对待你的这么多决策呢？我认为，这些决策要被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不能把其中的每一个当成是三、五年的单独的临时任务，一九五八年，在我国大办了人民公社，近几年，很多企业单位纷纷准备迁到乡下，去年你又提出了工业兼农、兼军、兼学，农业兼工、兼军、兼学，这三件事为什么没

有被人们联系起来看待呢？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我还不知道，但我觉得你似乎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建设共产主义公社的方针。

第三，最近，关于“最高指示”的口号喊得极为普遍，只要打着“最高指示”的旗子就可以干出各种犯法的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最高指示”真的应该凌驾在宪法的头上吗？我看不应该，要充分估计一下法的作用。

可能人们又要说：资产阶级曾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迷惑过劳动人民，我们今天就是要打碎资产阶级法律关于平等的遮羞布。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我们要打碎资产阶级法律。不是不要无产阶级法律。法律是人民向敌人专政的工具，但法律不仅对敌人有专政的作用，对人民也有约束自己的作用，需知人民中的分子，如不能遵守法律便有堕落成敌人的可能。正如，教育者需先受教育，制定法律的人要先遵守法律。

法律，即成文法，在从原始共产主义过渡到阶级社会时代代替了习惯法、法律，即成文法，还要送走阶级社会，促使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重新过渡到习惯法。革命运动往往要破坏旧法，但革命运动的成果却必须用新法来巩固它。最高指示只能产生一时的行动。法却能形成较长时期的制度。

最高指示是可以被人们自由解释的，这次运动已经表现出了这一点。伯恩施坦能够打着马克思的招牌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又能打着列宁的招牌搞修正主义，难道不可能有人再打着你的招牌搞修正主义吗？

最高指示的精神，可不可以通过法的形式贯彻给群众呢？

第四，现在，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是空前的思想统一了。是绝对统一吗？不，空前的思想统一，实际却是空前的思想自由（政治上的空前的大集中之下，存在着空前的大民主，与此道理是相应的）。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的事实仍然有助于启发我们的思考。

儒家本来是诸子百家中之一家，汉武帝时来了个独尊儒术，扫掉了其余各家，使孔夫子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之久，凡念书的人就都是儒家的人了。儒家的内部是统一的吗？独尊以前是不统一的，独尊以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仍然贯穿着儒家思想发展的始终。儒家内部的今文经和古文经，被打倒了过去的墨、道、名、法，外来的浮屠、摩尼，甚至基督，都改头换面，纷纷参加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一样，这是可笑的理解。但从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种思想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与此规律相符合是早已得到证明了的。

我要向你说的，就是这一些了。

这些都属于修正主义的吗？这些都是反革命的吗？我认为不是。如你所说，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刚出现的时候常常要被打到毒草堆里去。

话又说回来。

可能你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

也可能你看了以后会感到我所提的问题都很幼稚。前面说了，我是一个乡村学校的普通教师，对上层的事、国家大势知道得很少，自然不免有一些幼稚的思想，此信关于国际只提到在

变两字也是这个原因。还可能，你也把这些议论看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我遭到逮捕。不是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大字报就要捉起来吗？不过，我写的信，并不是大字报，我也不想我提的问题在公开场合进行宣传。过去，我在学习马、恩、列、斯和你的著作时作了一些杂记，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遗憾的是，红卫兵搜了我的东西，人们大吃一惊，把足有两个包袱的笔记和手稿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材料给没收了。去年七月，我写的与此信内容大致相同的一封信也被他们搜了去，他们剥夺了我给上级写信的权力。现在，我作了遭受逮捕的准备。为的是共产主义事业，为的不是哪一个人。

我是回家过春节的期间在大连写的这封信，信寄出后，我便回到宽甸。地址已经在前面提到了，信皮上的“旅大人民旅社”是借用的名词。

傅世安

1967年2月

#### （四）傅世安学习笔记（抄家查获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要在今后几年中观察此新阶段的具体内容。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跟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或反革命的人不同，这些人原来是党的干部或党的理论家、学术家，现在从革命队伍里分化出来了，对这些人，应该打击的是他的现在，处理方法也应跟过去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学术家有所不同，联系到这些人的历史问题也可以提，但不是主要的，更不应该把人家过去的功劳也歪曲成罪恶。如果把人家的功劳抹煞了，就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子。因为，人家的地位、工作是你使用的呀。现在犯了错，打击了他，并不能否定他过去的成就（当然也用不着在批判他的同时宣扬他的功）。他过去的成果（著作、发明、歌曲、绘画）对我们有用的，我们照样可以使用。就是地道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有了真正的对革命有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使用。

“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完全赞成。

“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怎样改呢？我有我的看法。

二、“主流和曲折”。

此次文化大革命利用的力量是最底层的群众，甚至是广大的十几岁的学生。这是毛泽东走到极端的表现。毛泽东的革命运动的方法就是用这一派打击另一派（阶级代表），革命是一层一层的，运用的力量也是一层一层的，此次运动的力量是纯底层的（与前几次运动不同）。

群众在这次运动中真正以主人的姿态出现了，可实际上群众是在这次运动中彻底地成了当权派（指毛泽东）的工具（直接的工具）。

群众在这次运动中以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发动起来了，冲垮一切权威（除主席之外），这些权威过去是主席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学术权威则是主席思想和群众之间的桥梁，领导干部权威是主席的行政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组织桥梁）主席要通过中间桥梁来领导群众。这次运动的结果，只有中央领导还起作用，而基层出现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有：在思想上会产生对主席指示解释的混乱，争权夺利的人要滥用这些指示，在组织上要造成不服从地方或基层的领导，争权夺利的人要滥用中央给他们的权力。

主席同志是否已经准备了解除无政府状态的方法呢？主席同志是否想到，群众对权威的否

定，将要报复到主席的自身呢？我为主席担忧，我要把这些意见提出来。

###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敢发动群众的意思就是不怕无政府状态。为什么不怕呢？就是相信群众能自己教育自己，能自己解放自己，能自己组织自己。群众是能够自己做这些事的，但是要集中的有纪律的领导才行，要对群众作严密的组织，不能仅依靠群众自己的觉悟（群众的觉悟是不齐的，无政府状态不但未使群众的觉悟提高，反而使落后面扩大），即以我校一班来看，学生的觉悟暴露出来了，学生之破坏纪律到了使所有领导人（特别是工作组）感到棘手的程度。大家都不敢说，“群众发动错了”，都硬着头皮拥护毛主席关于发动群众的指示。

敢发动群众的结果怎样呢？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怎样呢？

我是赞成这次群众发动的，因为群众的发动还要临到独夫的头上，最后实现民主、实现群众之权威，我在此次运动中受了整，这是我高兴的，因为我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干部是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句话指发动群众的目的是反对自己（的权威）。

###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两种方法：一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即完全依靠群众自觉，群众发动起来之后，群众自己写大字报揭露，群众自己组织批判。这种方法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不利于主席自己。

二种是写大字报，先由党的领导人指出方向（或对象），批判时，从批判的对象到批判斗争的内容都由党的领导人指出，指方向的方法可以有各种各样，此次运动没有公开指方向的现象，只有暗地里指方向的现象。领导运动的人（从工作组到原来的单位领导）作了这种指方向的工作之后，自己还不承认，还硬说，这是群众自己做的。既以批判我为例，本是他们布置群众造成声势打击我，却对我说他们在说服群众和风细雨（因为群众激怒了）。群众过去对我是高度赞扬的，不正是你们鼓动了群众对我的仇视吗？（教师群众并未从心里仇视我的为人，学生群众年幼无知，以为我真是狰狞的怪物呢？这种指方向的方法，就是把群众作为工具的方法，不是群众自觉的。

毛主席喊着前一种方法，实际进行的是包办代替的方法，虽然这样，也未减低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也未减低否定一切权威的作用。

我要给别人写大字报时，他们还横加阻碍。

让群众充分大鸣大放，群众自己就能阐明正确的、批判错误的，群众自己就能提高觉悟、增长才干、分清是非和敌我。这一点是能做到的，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说一些正确的话，群众中发生争论的结果总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群众的觉悟真提高了吗，一一叫他们去做实际工作，他们的觉悟就表现得降低了，也许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但没有权威了，在混乱状态里，每一个人都一面说着漂亮的话，另一面却无拘无束，随随便便破坏纪律，不认真工作，战争的时候能允许有这种现象吗？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怕出乱子。”——这些话都对，但不应该否定权威。混乱中，群众创造出新的事物了，而后要在混乱中建立新的权威，此新的权威要把群众创造出的新事物

使用、发扬起来，领导起来，要掌握住它。

“要信任群众，”——我要注意在今后的工作中信任群众，我们党并未信任群众，而是把自己的意见硬贯给群众。

“依靠群众。”——我要注意在今后的工作中信任群众，我们的党并未信任群众，而是把自己的意见硬贯给群众。

“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这是对的，真正革命的时候必须要有混乱时期，但毛主席只强调了这一面而忽视了和平时期的法制（均衡）。

具体表现有二：频繁的进行和发动革命运动，应有的较长时间的稳定被不断破坏了。革命时期不但是允许正常的秩序破坏，而且是有意识的挑动这种混乱（必要的混乱和破坏秩序是应该有的，我这里指的是不必要和不应该的）：如思想斗争，党的政策是和风细雨，宪法也规定了对人权的保护。我们的这几次革命运动都没有以反对宪法为目的，而且口喊着遵守党的和风细雨政策。运动中有的侵犯了人权，并未有遵守党的和风细雨政策，而是粗暴攻击，严重违犯宪法。是群众自己要违犯宪法和党的政策吗？不是，是党先号召他们那样做，而后借口群众运动不能文质彬彬、作虚假的解释。

##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下面的具体内容是怎样对待左、中、右派。

告诉我们注意区分有错话、有错文章的人和反党的右派分子。其实，所谓错话、错文章必然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事必然是反党的事。那么前者和后者是程度的不同罢了。

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和权威同一般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区分开来。其实，一般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有的文件中不是说反毛泽东思想就要被斗垮斗臭吗？这里说的学阀和权威与一般的反毛泽东思想只是程度的不同。可见此次运动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完全消灭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一切东西（根本就作不到），而首先先是斗垮那些有影响的当权派和权威。如果从这里解释，那么就跟毛主席在别的地方提到的允许唯心主义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不相矛盾了。

##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正常现象，群众在争论中会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按着实际情况，错误的意见就一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是反革命，那么人民群众中的争论就也会被打入敌我矛盾，把人民中的错误当成是敌人。

“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只要我们用的是给群众指框子和“方向”的做法，这一点就做不到。群众之辩论形成多数和少数，就必然将少数说成是错误的，甚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如此，则不可能不对少数人采取粗暴的作法。这里说保护少数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请问，工作组都撤走了，只由群众自己进行辩论，群众自然是依多数而定，怎么谈到保护少数，谁来保护少数。即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的，也允许他们申辩。说是这样说，一种意见一成了少数人的，就常被打入反毛泽东思想的行列，少数人怎样申辩呀？

##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里提到的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就是指地方和单位的领导把批评或反对他的群众当成反革命。十六条制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就是因为前几个月的运动出现此问题。

八、此次运动中群众自己创造出了文化大革命小组，委员会及代表大会和红卫兵等组织被当着合法的事。但反右斗争时，群众自己是不能随便集会和成立组织的，如有这样做的，便被当着是不服从党的领导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行为。

这几种组织的性质：一是群众性；二是党的领导。在运动期间，它是权力机构，一般情况下，它是群众教育自己的组织形式，是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用坏话来说，它是党拢络群众的中间，有了文化革命的委员会、而且是群众自己成立的，所以群众就觉得他是自己的，因而相信它。实际上这种组织是党领导成立的，而且还是党领导它时行工作。有了这种群众自己的组织，并不就是没有党的领导了。不过因为群众相信自己的组织，所以党通过这个组织领导群众将起更大的作用。

这里说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代表大会是常设的，依我看，常设化了，就要象过去的校务委员会了。

这些组织机构的产生要采取象巴黎公社一样的选举制，这次我校选举，不是由领导先提候选人，而是由群众自己选的，我国的人民代表及国家主席还都不是这样选举出来的。此次运动使群众的民主思想向前发展了一步，将来人们会要求把这种选举法推行到人民代表和国家主席的选举上的。

九、“教学改革”。

“要改革旧教育制度、方针及方法”，我是同意的，但我不赞成毛泽东的改革内容。凯洛夫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一，怎样达到这几点呢，我有自己的看法。第二，德育、智育、体育后面还应该有美育。

“学制要缩短”——我还需考虑，有可能赞成。“课程要精简”——我不同意，应该增多内容，增加科目。“教材要改革”——我同意，但不是改少，而是改得丰富，主要是提高质量，（教材质量高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质量，而是为工农兵的质量。这好比，同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农兵能看懂的文章，也有好的，有坏的）。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学文、学军、学工、学农，我很同意，并正在考虑实现的方法。

十一、又提出了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批判。批判就是打击你，就是消灭你，就是不让你放，因此这不应该算是“百花齐放”方针的对象，而应该是百花齐放中附带产生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指人民内部的，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的不同风格和学派的争论。

十二、这里提对科学家、技术人员、一般人员、一般工作人员只要是爱国的、积极工作的、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政策呢？因为他们

有思想上的错误了，而思想上的错误就都可以说是反毛泽东思想或修正主义思想的错误。有了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岂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就要对他打击，就不能利用他了，以逻辑推之，打击面必然愈来愈宽广了。

此次运动的特点就是专门打击那些爱国的、积极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因为重视业务，常常与毛泽东的思想相抵触。

十四、这里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更多、更快、更好、更省、”。这就告诉了我们，生产是最终目的，与“几论”突出政治中的说法不统一。

这里说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可实际上，我们现在正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有人喊政治进步，业务上敷衍，不认真，就要受到表扬，有人业务认真（其实政治并非不进步）就不只是受批评，而且要成为文化革命的对象。

十五、“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前面（笔记中）已经提到，此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保卫自己利用群众打倒他们头上的当权派和权威。毛泽东成了群众直接的领导者了（毛泽东走上最高点了，也就是深入到最底层、最广大的群众中了）。有一天，群众要用毛泽东给他们的武器反到毛泽东的自身。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实际上是相反。

※此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反复曲折意外之多过去历次运动所未有的。本来是革命者被当作反革命来斗，本来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被当作党中央的代表。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地方和基层单位失去了领导，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人们有了胡乱（按着自己的意图）解释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指示的机会。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